



一位傳教士在亂世
中國的生涯

闖關東的 愛爾蘭人

Frederick William
Scott O'Neill

Mark O'Neill
[馬克·奧尼爾] 著
牟京良 編譯

闖關東的 愛爾蘭人

Frederick William
Scott O'Neill

一位傳教士在亂世
中國的生涯

Mark O'Neill
[馬克·奧尼爾] 著
牟京良 編譯



闖關東的

愛爾蘭人

一位傳教士在亂世
中國的生涯

Frederick William
Scott O'Neill

Mark O'Neill

[馬克·奧尼爾] 著

牟京良 編譯

責任編輯
書籍設計

李浩銘
黃沛盈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三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版次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三十二開（140mm×210mm）二七二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201-9

© 2012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錄一

前言 追尋百年往事 頁八

第一章 從貝爾法斯特到滿洲 頁二九

第二章 中國式的苦難與災禍 頁五三

第三章 榮耀之光 頁九一

第四章 教會與社會同步發展的黃金十年 頁一一九

第五章 在日本的茶毒和精神控制之下 頁一六一

第六章 戰爭 頁一九五

第七章 回歸愛爾蘭，回歸中國 頁二一九

第八章 復活 頁二四三

鳴謝 頁二六八



一位傳教士在亂世
中國的生涯

闖關東的 愛爾蘭人

Mark O'Neill
[馬克·奧尼爾] 著
牟京良 編譯

Frederick William
Scott O'Neill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cnlong.com



聯合出版集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HK \$108.00

ISBN 978-962-04-3201-9



9 789620 432019

本書發現被遺忘的歷史滄桑，也發現湮沒多年的秘辛。作者的家史，也是中西文化愛恨交織的血淚史。

邱立本

亞洲周刊總編輯

此書乃兩位隔代旅華中國通，以東北小鎮為軸，跨越三個世紀，第一身現場記述劇變的中國，由晚清義和團起，經歷辛亥革命、軍閥時期、抗日戰爭等。過程既有大時代的驚濤駭浪，又富小鄉鎮的人情溫馨，給國史添上不可多得的補充。

周光葵博士

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

奧尼爾用三十多年時間，收集有關他祖父在中國東北傳教的資料，寫成了這本既是個人傳記，也是一本內容真實的中國近代史，值得推薦。

馮強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首席講師

作者馬克·奧尼爾是故事主人公的孫兒，在書裏透過講述這一位傳教士的事跡，向他偉大的祖父致敬之餘，亦以一個嶄新的角度來解構這段在中國歷史上充滿動蕩與變化的時期。

故事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奧尼爾在一八七〇年出生於當時是歐洲發達城市的貝爾法斯特（Belfast），從小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因受到家人宗教信仰的薰陶而在完成學業後成為愛爾蘭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of Ireland）的牧師。從一八九七年首次踏足滿洲以來的四十五年裡，為把福音傳遍中國東北的使命作了許多貢獻，期間見證了義和團之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抗日戰爭等歷史大事。



闖關東的 愛爾蘭人

Frederick William
Scott O'Neill

一位傳教士在亂世
中國的生涯

Mark O'Neill
[馬克·奧尼爾] 著
牟京良 編譯



目錄一

前言 追尋百年往事 頁八

第一章 從貝爾法斯特到滿洲 頁二九

第二章 中國式的苦難與災禍 頁五三

第三章 榮耀之光 頁九一

第四章 教會與社會同步發展的黃金十年 頁一一九

第五章 在日本的茶毒和精神控制之下 頁一六一

第六章 戰爭 頁一九五

第七章 回歸愛爾蘭，回歸中國 頁二二九

第八章 復活 頁二四三

鳴謝 頁二六八





法庫教會工作人員為弗雷德里克·奧尼爾祝壽聚會，背景房屋為奧尼爾夫婦居所，攝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前言

追尋 百年往事

對在中國的外國記者來說，一九八六年是重要的一年。報紙上開始公開熱烈地討論政治體制改革，這在中國是很不尋常的。尤記得那天我在路透社駐京辦事處，窗外是暖和的春日，我正在翻著當日的《人民日報》，在報紙內頁，我看到一則關於「外國人」的報導：中央決定對外國人開放國內二百四十個城市，我馬上在列表裡，找出東北遼寧省那一部份，再逐一仔細尋找後，終於如願找到「法庫」這個名字。

法庫位於遼寧省府瀋陽以北約一百公里，對很多人而言，她或許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地方，但對我和我的家族來說卻有特殊的意義。我的祖父弗雷德里克·奧尼爾（Frederick O'Neill）是一位愛爾蘭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Ireland）早期的傳教士，從一八九七至一九四二年，他一直在法庫工作，而我的父親自出生到六歲都是在那裡度過他的童年，年幼的他當時已講得一口流利的東北話，返回英國後，雖然已經慢慢生疏，但他仍然記得兩個詞語，一個是「餃子」——他童年時最喜歡的食物；另一個是罵人的髒話，他從始至終都不肯告訴我其甚麼。「法庫」這個地方也是從家人口中得知，後來讀了祖父寫的三本書，令我加深了對法庫和中國的瞭解。

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執掌中國政權後，傳教士被迫離開，中西文化間的往來隨之中斷。此後幾十年，中國於西方國家而言，又陌生起來。

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國曼徹斯特的一間電視台當研究員，當時曼徹斯特住了頗多華人，走在華人社區裡，我有一份既親切又好奇的感覺。到了一九七五年，英國廣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在北愛爾蘭的首都貝爾法斯特（Belfast）提供了一個工作機會，我被取錄後非常興奮，因為貝爾法斯特既是祖父的故鄉，也是長老會總部的所在地。

當時北愛爾蘭正值獨立運動風潮，衝突演變成暴力，在一九六九年更開始有游擊戰的徵兆。雖然這惡劣的環境令大多數人不願到那裡工作，但對我來說，這卻是個難得的機會。被取錄後，我在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附近租了和祖父故居相似的維多利亞式紅磚屋裡的一個小單位居住。為了追尋祖父的足跡，我走到他接受傳教士訓練的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古老的建築物裡，有一座宏偉的圖書館，在矗立百年的學院和學術氛圍籠罩下，不難想像祖父走在圖書館前、林蔭道旁，踏著落葉上學的情景。

沒想到一次採訪成為我人生的轉捩點。轉職到貝爾法斯特後數月，我到了長老會總部訪問長老會的秘書長傑克·韋爾（Jack Weir）。因為那一次訪問的主題是敏感的北愛爾蘭和平問題，而且因為他當時也被捲入政治紛爭中，所以整段對談的氣氛相當凝重。訪問結束後，我對了韋爾說我是弗雷德里克·奧尼爾的孫兒，他嚴肅的神情馬上融為微笑。他雀躍地說他的父親也曾是中國東北傳教士，然後領著我到教會內一個大房間，裡面的牆壁上掛滿了歷任教會輪任主席的照片。韋爾帶我走到一九三六年的位置，並指著祖父的照片。

我呆立了很久，看著祖父高高的額頭、嚴肅的神態和深邃的眼神。這一張照片令我漸漸感受到當時驅使他從貝爾法斯特走到中國東北的堅強信念。

從一八六九至一九五一年，愛爾蘭長老會共派了九十一名傳教士到東北，當中四十八人是女性，其中十四人更是醫生。我在貝爾法斯特的日子裡，除了日常的採訪工作之外，還拜訪了一些同樣曾到東北的傳教士。我對其中兩位老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她們向我細訴在東北生活的點滴，在教會的工作，以及在攝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下使用的一種叫做「炕床」的特別睡眠設備。最令她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恐怖的瘟疫和綁架民眾（包括外國人）的土豪。反觀在現代化的貝爾法斯特，富足的物質生活、便利的交通和中央

暖氣等，一切看似必然。正因為這樣，很難理解為甚麼這些傳教士會甘願放棄在家鄉豐衣足食的生活，而選擇長途跋涉去無論居住環境或者生活水平都不理想的東北。

在貝爾法斯特生活了三年半後，我開始計劃轉換環境。碰巧這裡有一位曾經在香港電台工作的上司，他說可以引薦我到那邊工作，希望我能夠把握這個可以累積寶貴經驗的好機會。於是我轉職到香港當記者及編輯。這一份新工作意味著我將和中國愈來愈接近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抵達香港啟德機場。香港當時已經是遠東地區最富裕的城市之一，然而，這裡稠密的人口和炎熱的天氣與那兩位女傳教士口中的那個中國大異其趣。一個月後，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在會上宣佈改革開放政策，重新開啟封閉近三十年的大門，而我亦在一九八〇年首次踏足北京和上海。

在北京，我拜訪了一位在英國商行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工作的蘇格蘭籍女士。她邀請我到當地的餐館，吃一種我自小就耳熟能詳卻未曾品嘗的食物——餃子。餐館裡，不大的地方擠了約六十名食客，所有人穿著藍色中山裝。當他們看見我們這兩個「大鼻子」後便開始圍繞我們的餐桌，熱烈地討論著我們。儘管如此，我們沒有感受

到任何敵意，反而覺得他們十分友善，所以會講國語的她開始跟他們交談。那一刻我在想：當年祖父在瀋陽或大連的餐館，情景也應是如此……想到這裡，當時我真有一刻衝動，馬上坐火車到離北京不遠的東北去。當時心裡在想：既然中國的大門已被開啟，外國人日後一定會有機會到那裡工作！所以我開始籌劃，也在語言上作準備。

回到香港後，除了日常工作，我開始學習廣東話，後來跟香港電台約滿以後又搬到台灣學習國語。在台灣，我每天上午去語言學校上課，下午到《每日聯合新聞》當編輯。這是一段很美好的回憶，因為無論是我的老師或者周遭遇到的人都非常友善。一九八三年，恰巧路透社在文革期間關閉的北京辦事處獲當局允許重開，我趁這機會到那裡應徵。然而，當時我的國語還沒達到應有的標準。輾轉回到香港工作半年，再到新德里工作十四個月後，我終於在一九八五年夏天被分派到北京辦事處工作。

法庫

在一九八六年的那一天讀完《人民日報》的報導後，我決定動身到法庫，上司批准了我的探訪計劃。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循著祖父的足跡，我將探尋陌生而神祕的「法庫」。在二十世紀之前，那個地方不要說對於傳教士是未開發的處女地，即便對於遼寧



法庫縣城街景，攝於一九八六年春。

省以外的中國人來說，知之者亦寥寥。事實上，在當時大多數中國人眼裡，整個東北地區在地理上都是偏遠荒涼的，文化上疏離於漢文明核心，在中國歷史資料裡面所佔的篇幅與其面積之廣大遠不相稱。

「法庫」一詞來自滿語，字面意思是「魚梁」，一種修築在河流中用來捕魚的堰壩。這個名字或許源於法庫南部一條很適合用魚梁來捕魚的河流。

法庫在戰國時代就有人定居。在成百上千年裡，這裡一直是中華帝國與異族之間的邊境，異族大多是遊牧民族，例如匈奴、東胡、契丹、女真等，他們與漢族之間時有衝突。在金代和元代，遊牧民族成功地入主中原，建立帝國，融入中華文明，從而把法庫併入中華帝